

## 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深度透視

● 夏松濤

葛著將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聯繫起來，探討了民族主義與消費主義之間的歷史紐帶，深入論證了國貨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認同。



葛凱 (Karl Gerth) 著，黃振萍譯：  
《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葛凱 (Karl Gerth) 的《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以下簡稱「葛著」，引用只註頁碼) 2007年12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將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聯繫

起來，第一次探討了民族主義與消費主義之間的歷史紐帶，深入論證了國貨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認同。

對於讀者來說，葛著的標題就有些奇怪——「製造中國」是甚麼意思？是不是把「中國製造」寫反了？顯然，作者以此作為書名，自有獨特的考慮。葛著認為，基於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建構的影響下，消費文化被符號化和象徵化。在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背後，是不同利益相互交織的場域，民族主義與消費主義的融合構成了生活在「現代中國」的基礎，故可以說「製造中國」。

關於國貨運動的研究，學界一直比較重視，並且有很多不同的研究視角。在改革開放以前，學界基本上採用革命史的視角，把國貨運動作為典型的反帝事件納入革命史的框架。改革開放後，一些新的研究視角介入，如社會史的視角、民族主義的視角、國民外交的視角、地方史的視角，以及馮筱才的「產權—秩序」視角，極大地推動了國貨運動的研究。葛凱在梳理學術史研究後，發現學術界的有關研究幾乎沒有討論消費主義的問題，更沒

有揭示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關係。所以，葛凱通過消費主義來透視國貨運動的發展，視角獨到，很有新意。

葛著緊密圍繞消費主義，深入論述國貨運動，主要表現在論述西方的草帽、雨傘、香煙等進入中國的消費意義(第一章)，頒布新的限制奢侈消費的法令、要求服裝使用中國製造的紡織品(第二章)，頻繁進行反帝主義的抵制活動(第三和第四章)，舉辦大規模的展覽會和發布無數廣告來提倡消費國貨(第五和第六章)，舉辦婦女國貨年(第七章)，以及大量發行愛國商人的傳記(第八章)。國貨運動的方方面面創造出了民族消費文化，這種文化促使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

民族主義與消費主義是影響近現代歷史進程的兩大力量，兩者看似沒有甚麼關聯，怎麼能聯繫在一起呢？葛凱認為主要是由於國貨運動把兩者聯繫起來，他從四個部分進行了探討。第一部分主題是語境和個案研究，交代了國貨運動的基本情況；第二部分考察了作為頻繁發生的反帝主義抵制外貨運動基礎的國貨運動，這種抵制外貨運動使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之間的聯繫廣為人知，也使得反帝主義的抵制外貨運動確實愈加擴大到所有的中國人中；第三部分探討了民族主義的商品展示方式，例如產品展覽會、百貨商店、博物館和廣告，這些方式產生並界定了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微妙關係；第四部分通過國貨運動中兩個重要的原型——「叛國的、奢侈的女性消費者」和

「愛國的男性生產者」來揭示國貨運動是如何界定性別規範的。

在論述國貨運動中，葛凱把問題意識與敘事史學有機結合。「問題導向」是所有現代化史學流派共同特徵。法國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的創始人之一費弗爾(Lucien Febvre)曾說：「提出一個問題，確切地說來是所有的史學研究的開端和終結。沒有問題，就沒有史學。」(鮑紹霖等：《西方史學的東方迴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191。)葛著幾乎每章每節都會提出有意思的問題，讓讀者思考。

葛凱還善於講故事，給人一種身臨其境之感。雖然沒有傳統的中國史學著作中條分縷析、現象羅列的細緻考訂，但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以及穿插在故事間的聯想與分析，給人很深的印象。比如一個學生團體的領袖跑去勒索一些商人，不給錢的話，就叫大家說他的商品是洋貨，後來學生領袖惡劣的行為被揭發，鐵血團就把他暗殺了(頁12)；再如有一個小孩不穿用日本毛料做的衣服，天天在學校跑步以抵禦嚴寒，跑着跑着成為整個縣城裏賽跑比賽的第一名(頁209)。無論史學如何演變，「故事」始終是歷史的中心線索，而講故事的能力則是歷史學家最基本的技藝和看家本領(馬敏：〈追尋已逝的街頭記憶——評王笛著《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歷史研究》，2007年第5期，頁176)。葛凱通過敘述和描寫，引導讀者進入事件內部，從而以比較明晰和直

葛著幾乎每章每節都會提出有意思的問題，讓讀者思考。葛凱還善於講故事，給人一種身臨其境之感。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以及穿插在故事間的聯想與分析，給人很深的印象。

對於國貨運動的研究，圖文資料有助於彌補因缺乏文字資料而導致的歷史畫面的缺失，讓讀者回到國貨運動具體的歷史場景，體味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

接的方式來闡明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葛著還運用文化符號學的方法，對國貨運動中廣泛涉及的髮型、服裝、展覽等很多隱喻現象加以分析，生動地勾勒出國貨運動的發展脈絡。作者挖掘資料的能力令人嘉許，該書的參考書目超過70頁，遠過於其他相關著作，為葛著的精湛立論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

此外，該書還收入了51張圖表，包括難得一見的好圖片，如國恥扇、牙膏防禦戰、「天廚」味精轟炸機、對辮子的兩極解釋、國恥紀念宣傳畫、愛國的膠鞋、聖誕老人賣的香煙……這些形象的資料，起到了「讓資料自己說話」的效果，真正建立起國貨運動「可觸摸的歷史」。從中，讀者可以得知許多饒有趣味的史實：如孫中山採用了從德國借道日本傳到中國的、沒有清晰民族特色符號的、「折中樣式的」中山裝；借用優生學的口號，國貨運動的印刷品常常把商品描繪成「國血」；在國貨運動的產品中，既出現了「華生」牌、「抵羊」牌、「九一八」牌等民族主義或「國恥化」的品牌，也產生了「亞普耳」牌燈泡這樣有意模糊自己國貨身份的產品。已逝的歷史本來是有形多彩的，是五光十色的人類生活史的總匯。對於國貨運動的研究，圖文資料有助於彌補因缺乏文字資料而導致的歷史畫面的缺失。作者通過這些圖片，將國貨運動立體呈現，讓讀者回到國貨運動具體的歷史場景，體味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

縱覽全書，國貨運動作為國民表達民族主義的最普遍的路徑，它為國民提供了一個表達民族主義的彈性平台，在這個平台上國民可以獲得表達自己情緒和利益訴求的權利。葛著認為「國貨運動致力於創建民族國家，它不僅僅是通過傳播一種新的建立在大眾品位和生活習慣基礎之上的消費文化……，而且試圖通過排外性的消費限制，只允許消費國貨，並為此經常使用暴力手段。此外，還根據『國貨』的原材料、勞動力、經營者和資本四個方面來衡量考察它包含多少民族國家的內容」（頁16）。於是，國貨運動使民族主義融入了中國新生的消費主義文化環境中。反過來，民族主義的消費文化又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這種文化影響最後成為國貨運動的主要成就。葛凱認為：「消費主義在民族主義明晰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基本角色，同時，民族主義對於界定消費主義也是如此。對所有商品進行『本國』和『外國』的區分，有效地產生了『叛國的產品』和『愛國的產品』這兩個概念，這就使得民族主義塑造出了萌芽中的消費文化的基本形態。」（頁4）

在葛凱筆下，正在興起的消費文化傳播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也反過來塑造出萌芽中的消費文化的基本形態。這一相互交融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也促進了普通中國老百姓作為近代國家公民的形成，故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這種融合構成了生活在「現代中國」的基礎。這就論證了國貨

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認同。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一部有分量、高水準的著作大體要做到三點：全面扎實的史料基礎、獨特清晰的問題意識和對相關研究成果的反思性對話。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葛著是一部高水準的著作。現今，不少國內外學者對葛著有很高的評價，但筆者從更為苛刻的研究眼光和更為嚴謹的學術態度來看，葛著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遺漏了少量重要的歷史場景。如新文化運動中有很多關於國民生活問題的討論與爭鳴，與消費主義有一定的聯繫，可以展開討論。又如1929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對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破壞及其對國貨運動產生的負面甚至消極的作用，消費主義的研究對此應該多加涉及。就「小歷史」與「大歷史」的關係來看，真正理想的歷史敘事離不開歷史表象背後的大邏輯。國貨運動現象不可能孤立存在，其背後重要的歷史場景對其發展肯定有重大影響，只有釐清更深層次的歷史規律與內涵，才能更深刻地解讀國貨運動。

二、對中國相關研究有些忽視。葛著在第二部分醒目的目錄上，沒有涉及1920至1922年的國貨運動，文中也沒有交代，這可能是作者疏忽所致。據筆者考察，1920至1922年的國貨運動影響也比較大，在各種報刊上可以看到相關的資料，一些學者或多或少進行了相關論述，葛

著可以把相關研究充實到論述中去。另外，葛凱的觀點還有其他闡述與分析的可能。在解讀消費主義的時候，可從國民性的角度來思考，因為消費行為和消費環境、市場價格、商品品質、民眾心理等緊密聯繫；消費文化的產生和發展與民眾的行為與心理也應該緊密聯繫，而中國人的行為往往同國民性聯繫在一起，魯迅、梁漱溟、梁啟超、胡適等都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所以葛著在這方面應該注意。

三、部分章節的論證略顯單薄。如最後一章只談到了吳蘊初一個人的故事，實際上像這樣的故事有很多，如果作為個案研究尚可，但單獨作為一個章節，很難讓人全方位地了解愛國企業家角色的轉換與塑造。又如談到新生活運動緣起時，用「據說是因為蔣介石目擊到一個小孩在蔣夫人面前撒尿」（頁294）來解釋，這的確不能讓人信服。此外，葛著涉及的只是城市的消費主義演進，忽略了鄉村的消費主義發展。中國是個農業大國，洋貨對鄉村消費影響很大。儘管作者有少量文字交代，但這畢竟是個十分重要的部分，值得深入探究。

總之，作為社會文化史著作，葛著無疑是近代國貨運動研究的佳作。無論在學術理念、研究視角、論證方法，還是歷史書寫等方面，該書對當前國內的相關研究，都具有一定的衝擊性。它既為我們深入思考消費主義提供了契機和動力，又為國貨運動的研究奠定了具有分量的基石。

作為社會文化史著作，葛著無疑是近代國貨運動研究的佳作。無論在學術理念、研究視角、論證方法，還是歷史書寫等方面，該書對當前國內的相關研究，都具有一定的衝擊性。